

“艺术是通往他者的桥梁” ——论查尔斯·约翰逊的小说伦理观

陈后亮, 申富英

(山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济南, 250014;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 约翰逊的小说一直面临很多争议。有人称赞他在新奴隶叙事方面拓宽了黑人文学的美学疆界, 也有人批评他背叛了黑人民族主义传统。其实对约翰逊来说, 文学创作的美学目的与政治目的是统一的, 不管是为了创作美的艺术还是为了更正义的社会, 都是对真善美的追求。真正的道德小说应该引领人们消除隔阂、增进了解, 为共建一个和谐美好的“友爱社会”创造条件。这样的使命既是伦理的也是政治的, 因为它不仅意在改善跨越种族、阶级、肤色和地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且渴望最终带来社会改变。

关键词: 查尔斯·约翰逊; 道德小说; 小说伦理; 新奴隶叙事

中图分类号: P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5)06-0173-07

美国非裔作家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 1948-)被誉为“二战之后美国文学界最重要、最有创新性的严肃小说家之一”^[1](481)]。他不但创作了很多虚构小说, 而且在黑人文学理论方面也有系统独到的见解。本文主要讨论约翰逊小说创作的伦理旨归, 包括他对传统奴隶叙事的戏仿和改写、他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伦理学传统的关系、以及他的文学创作的政治性等。受其启蒙导师、“道德小说”的倡导者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 1933—1982)的影响, 约翰逊也非常强调艺术创作的道德使命感, 但同时坚决反对把道德教条当成文学的主要内容。对约翰逊来说, 真正的道德小说不是告诉人们如何用一套抽象的道德公式去做出具体的道德判断和伦理选择, 而是引领人们消除隔阂、增进了解, 为共建一个和谐美好的“友爱社会”创造条件, 这才是真正伟大的道德小说应该履行的社会使命。这样的使命既是伦理的也是政治的, 因为它不仅意在改善跨越种族、阶级、肤色和地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且渴望最终带来社会改变。

一、约翰逊与新奴隶叙事

在谈论“新奴隶叙事”之前, 我们有必要先了解

什么是“奴隶叙事”(slave narrative)^①。盖茨曾说过, 奴隶叙事是指“关于黑人被奴役的书面或口头证词”^[2](153)]。作为美国非裔文学的主要源泉之一, 它主要盛行于19世纪, 尤其是美国废奴运动和南北战争期间。由于黑人大多不识字, 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由黑人口述再经白人誊写而成, 据说至少有数千名黑奴都曾参与或直接创作这种叙事文本。总体来讲, 奴隶叙事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文学形式, 主人公往往就是叙述者本人, 在内容上也主要讲述奴隶主如何残酷虐待黑奴、以及黑奴如何逃离迫害寻找自由的过程等。奴隶叙事在揭露蓄奴制度的残暴、推动废奴运动发展方面意义重大, 对于加快黑人文学乃至整个美国文学走向成熟也功不可没, 但不可否认的是, 由于人物类型单一, 情节简单雷同, 它自身的文学价值远远低于其政治宣传价值。正如提姆·瑞恩(Tim Ryan)所指出的: “它对黑奴逃亡经历的传奇性渲染和通俗化煽情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奴隶经验的本质; 它对个人才能和英雄主义的强调也在无意中贬抑了黑人群体的反抗斗争, 弱化了黑人家庭和群体在摆脱蓄奴制对他们的心理塑型方面发挥的作用。”^[3](88-89)]客观来说, 奴隶叙事对蓄奴制度的反思和批判主要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 很少对自由、种族和身份等问题做出更有深度的思考。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 以托妮·莫里森、爱丽

收稿日期: 2015-08-15; 修回日期: 2015-10-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非裔美国作家查尔斯·约翰逊小说研究”(14CWW02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 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13&ZD12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非裔文学史》: 翻译与研究”(13&ZD127); 中国博士后基金第55批面上资助项目“伦理批评视角下的查尔斯·约翰逊小说研究”(2014M552063)

作者简介: 陈后亮(1979-), 男, 山东临沂人, 文学博士, 山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非裔美国文学, 伦理批评; 申富英(1967-), 女, 山东菏泽人,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导, 主要研究方向: 现代主义小说

丝·沃克、欧内斯特·盖恩斯、伊什梅尔·里德以及查尔斯·约翰逊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黑人作家集中出现,他们大大改变了人们对奴隶叙事的传统印象。他们在作品中经常套用传统奴隶叙事的范式,却又大量借用各种复杂的现代和后现代叙事手法对其进行大胆戏仿、改写和重构,形成了一种颇为引人关注的新奴隶叙事风格。阿什拉夫·拉什迪(Ashraf Rushdy)在为《牛津美国非裔文学指南》撰写“新奴隶叙事”词条时对其作了更明确的界定,认为它是指“那些以描述新世界的蓄奴制经历及其影响为主的现代或当代虚构作品”,其主要特征是“把蓄奴制当作一种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和挥之不去的社会影响的历史现象加以再现”^{[4](533)}。后来拉什迪再次称新奴隶叙事是指那些“套用南北战争之前的奴隶叙事的形式、文本惯例和第一人称叙述的当代小说”^{[5](3)}。

拉什迪还对新奴隶叙事的不同类型做了区分。第一种类型是“要么把情节设定在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奴隶群体中,要么以第三人称叙事方式重温曾身为奴隶的人对那段经历的记忆”^{[5](375)}。莫里森的《宠儿》(1987)和芭芭拉·蔡斯-里布的《莎丽·海明斯》(1979)便是其中的代表。第二种类型则“把情节放在20世纪晚期的当代美国,但或明或暗地涉及那些祖先曾经为奴的现代男女们的生活或心理问题”^{[6](375)}。这种类型在美国当代黑人文学中所占比重最大,像赖特的《土生子》、埃里森的《隐身人》、戴维·布拉德利的《昌奈斯维尔事件》(1981),奥克塔维亚·巴特勒的《家族》(1979)、以及格洛丽亚·内勒的《林顿山》(1985)等皆属此类。第三种类型是“家谱叙事,即通过追溯一个家族在广阔范围内的黑人经验来再现奴隶经验”^{[6](375)}。其中最最有影响的当属亚历克斯·哈利的《根》(1976),此外还有玛格丽特·沃克的《欢乐》(1966)和约翰·埃德加·怀德曼的《达姆巴拉赫》(1981)等。第四种类型则是“模仿奴隶叙事的形式和传统的文本”^{[5](375)}。比如里德的《逃往加拿大》(1976)和盖恩斯的《玫瑰曼小姐自传》(1971)等。

除了第三种以外,其余三种类型在约翰逊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得到,比如,约翰逊的两个短篇故事《对明戈的教育》(1977)以及《魔法师的学徒》(1986)属于第一种,《菲丝与好东西》(1974)和《梦想家》(1998)属于第二种,但约翰逊最大的成就还是在第四种类型的创作上,即套用传统奴隶叙事的基本框架,但又不断对之进行戏仿和颠覆,从而达到后现代理论家琳达·哈琴所说的那种“以戏仿的形式既使用又滥用、既确立又动摇惯例”^{[7](23)}的效果,他的《牧牛传说》(1982)和《中间航道》(1990)代表了他在这方面取得的

最高成就。派克曾指出,如果我们在讲述与美国南方蓄奴制有关的历史时,非但不提及那些灭绝人寰的暴行和剥削,反倒用充满诙谐的语调谈论很多让人难以置信的轻松甚至浪漫话题,这样的做法一定会被认为是“没良心的”^{[8](7)},黑人读者一定会谴责这是对民族历史的背叛。我们在读约翰逊的作品时的确会有这种感觉,我们感觉到了黑人文学中少有的轻松幽默,知道了黑人在历史上除了被奴役之外的一些鲜被提及的生活经验。他笔下的白人奴隶主往往不是凶残的统治者,而是开明仁慈的家长,比如《牧牛传说》中的乔纳桑和《中间航道》中的钱德勒等。黑人主人公也往往不是机智勇敢的逃亡英雄,而是带有一些“萨姆博”^②劣根性的反英雄,比如《中间航道》中的鲁特福德。更重要的是,约翰逊没有遵循经典奴隶叙事的“识字—身份—自由”的结构模式,而是更接近伊丽莎白·安·博利厄所说的“家庭—身份—自由”的女性黑奴叙事模式^{[9](8-10)}。在约翰逊的所有作品中,家庭生活都是他非常着重考虑的伦理主题,这也是他的新奴隶叙事非常有特色的一点。

约翰逊对新奴隶叙事的采用源自他对传统黑人文学的不满。他于2008年发表在《美国学者》上的文章《美国黑人叙事的终结》清楚表明了他对奴隶叙事的失望态度,以及他渴望为黑人文学寻找未来的动力。他在该文中强调,任何一个好故事都必须能够给读者带来一切精神启发,“为我们揭示某些东西”^[10]。传统奴隶叙事总是在讲述黑人受难的经历,以至于形成一种思维惯例,即黑人永远是蓄奴制的受害对象,“它是我们的出发点、公认的前提、以及谈论美国黑人时最重要的预设”^[10]。然而在约翰逊看来,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的美国完全不同于100多年前的美国。蓄奴制早已被废除,虽然不能说黑人已经获得了与白人完全平等的社会地位,但至少他们已经拥有了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没有人可以阻拦他们实现多彩人生的愿望。黑人再也不是千人一面的受害者,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今天的美国黑人,我们都会发现他们是一个复杂多面的群体,不能把他们简单归类为某一种群像。他说:“再也不能简单认为美国黑人生活的本质就是种族迫害和剥削、是诅咒和惩罚、是被肤色注定的命运了,在这种尚未出生便已被决定的命运里,生命的意义已完全被物化。”^[10]

约翰逊认为,今天的黑人经验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异质多元性,黑人中间也已经出现了总统、国务卿、州长、参议员、将军、学者、企业家等数不清的杰出人士,我们需要去记述和再现这些黑人经验的不同侧面。然而让人失望的是,仍有太多黑人作家习惯于用

老套的奴隶叙事方式讲故事, 他们看不到社会进步和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 拒绝相信黑人的生活境况已有了实质性改善, 即便像奥巴马当选美国首任黑人总统对他们来说也意义甚微。他们脑子里仍然装满了半个世纪以前的经验素材。约翰逊强调, 我们并不否认奴隶叙事在历史上的价值和贡献, 但如果总是重复讲述或聆听这样的故事就无异于对今天的现实视而不见, 它会让人思维僵硬, 看不到变化。他说:

作为一种阐释工具的古老黑人叙事已然失去有效性。……在 21 世纪, 我们需要更新更好的故事, 需要新观念、新词汇和新语法, 它们不是筑基于过去, 而是立足于激动人心的、未被探索的、充满未知风险的当下。同时我们应该知道, 每一个故事至多不过是对现实的一种暂时性解读、一个现象学意义上的侧面像, 它们在每一天都有可能被修改, 如果不是被完全推翻的话。这些叙事都不会声称自己是绝对正确的, 相反它们都谦虚地把自身呈现为一种非常有试探性的假设, 不管它们多么有限, 都必须每天接受来自我们自身的经验以及一切手头拥有的可靠证据的检验。^[10]

约翰逊特别强调东方传统宗教和哲学思想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奴隶叙事有很大帮助, 因为它们支持并深化了黑人对“自由”和“身份”的理解, 并“为我们实现现实的改变提供必要的内在革命”^{[11](xvii)}。约翰逊和马丁·路德·金一样, 坚信社会变革必须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同时进行, 一条战线上是改造外在社会, 另一条战线上是改造内在灵魂。相比之下, 今天的美国社会在前一条战线上已经取得不小的成就, 但在后一条战线上却进展缓慢。而他自己通过与东方宗教的深入接触, 逐渐实现了自己的内在革命。在一个经常把黑人妖魔化为懒惰、愚蠢、不负责任的暴力分子的社会里, 他没有自暴自弃, 而是“履行自己作为丈夫、儿子、作家、教师、同事、编辑、邻居、朋友和公民的义务, 无私地服务于他人”^{[11](xvii)}。从表面看上去, 约翰逊的作品似乎充满了对经典奴隶叙事的戏仿和嘲讽, 但他的真实目的绝非单纯为了颠覆一种文学传统, 而是为黑人文学寻找更好的未来。恰如钱德勒(Gena Chandler)所评价的, 约翰逊拒绝黑人叙事的目的是为了“选择讲述不同类型的故事。在他那里, 斗争的对象是自我, 而非外在的种族主义力量、种族偏见或在(传统)黑人文本中经常出现的其他主题”^{[12](338)}。

二、约翰逊与实用主义伦理学

约翰逊受加德纳的影响很大, 他的创作始终带有

强烈的伦理责任意识。然而他对以康德、穆勒和边沁等人为代表的欧陆道德哲学传统很不认同, 并经常把他们的伦理思想当成自己揶揄的对象。由于约翰逊对东方宗教情有独钟, 东方宗教伦理尤其是佛教伦理被很多人视为他的伦理观的最重要基础。然而近些年来, 有不少研究者逐渐倾向于把约翰逊的伦理思想与美国最具本土特色的实用主义哲学传统联系起来。

实用主义一般被认为发源自 19 世纪的超验主义者爱默生, 中间经过查尔斯·皮尔斯和威廉·詹姆斯发展完善, 再由约翰·杜威发扬光大, 逐渐确立为美国最具本土特色的哲学流派。上述四人也一直被视为实用主义的正统谱系。然而波斯诺克(Ross Posnock)却为我们找出了实用主义在美国黑人思想家中传承的脉络, 即“从詹姆斯到杜波依斯和艾伦·洛克”^{[13](84)}。虽然后两者在思想上存在不少分歧, 但他们都同样从詹姆斯那里受到重大影响, 尤其是吸收了后者关于“实用多元主义”的思想。^③除了杜波依斯和洛克以外, 波斯诺克还把实用主义在黑人思想家中的传承谱系一直延伸至今, 包括克拉梅尔(1819—1898)、霍普金斯(1859—1930)、图默(1894—1967)、赫斯顿(1891—1960)、埃利森(1914—1994)、莫瑞(1916—2013)等, 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不相信有什么本质意义上的种族身份, 但与此同时仍采取他们认为最符合自己的种族利益的行动, 而不是袖手旁观”^{[13](85)}。他们都放弃了狭隘的黑人民族主义观, 而是呼吁人们承认和保留不同种族的文化属性, 倡导多元主义的文化身份观。正如格里森(W. Gleason)所说: “约翰逊是杜波依斯、洛克和埃里森等人的詹姆斯实用多元主义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最重要的黑人实践代表。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民主世界主义、他们对种族逻辑的质疑以及对不同文化相互重叠交织的信念, 而且还继承了他们担当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13](87)}

格里森把约翰逊看作是黑人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今美国的重要代表, 这种看法并不为过。塞尔泽也指出: “自 1990 年代以来, 约翰逊越来越被看作是公共知识分子。”^{[14](158)}近些年来, 约翰逊越来越多地开始在报纸和电视上发表涉及社会公共话题的言论, 他的多篇文章, 比如《被我们抛弃的金》(1996)、《第二条战线》(1997)、《站在公共立场上思考》(1998)、《我们所需要的金: 对一个正在寻找自我的国家的教谕》(2005)、《我们是否将获胜? ——当今美国非裔人的状况》(2006)、《巴拉克·奥巴马的意义》(2008)等, 都清楚表达了他对当今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强烈实用主义关注。

不可否认, 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一部分, 实用主义伦理学不可避免地带有功利主义的成分, 但无

论是在皮尔斯、詹姆斯还是杜威那里,实用主义都不能被简单等同于功利主义。正如斯托霍夫所指出的,虽然实用主义伦理学也关心道德行为的实际后果问题,但它更强调的是道德主体与伦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即“人必须考虑由(自身所处的)某个道德立场引发的实践行为,而一旦他做出了选择,就应该在该选择行为的语境下调整他对现实的认识”^{[13](107)}。我们在特定情况下做出什么样的伦理选择并非由预先存在的伦理法则决定,而是取决于我们对当下现实条件的理解和判断,但这种理解和判断又必定是片面的、暂时的。由于我们需要不断调整和修正我们对环境的认识,我们所获得的真理或知识也就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有赖于具体语境下的判断。斯托霍夫认为,这并不等同于道德相对主义,而是强调“我们做出新的(伦理)实践时,不能简单依赖于过去对世界的认识,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了以前的现实语境”^{[13](107)}。换句话说,我们对环境的认识必须“与时俱进”、随时调整。在约翰逊的小说中,凡是不能用变通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人,尤其是那种总是执著于头脑中的僵化的种族思维模式和观念的人,往往都会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比如《牧牛传说》中的乔治、《梦想家》中的祖贝纳,《中间航道》中的法尔肯等。他们用本质主义的眼光看待自我、世界和他者,看不到生活还有变化的可能。

不难看出,这种实用主义的伦理观蕴含着反本质主义的思想,即任何事物在某个时刻之所以是其所是,不是因为它具备了某种本质属性,而是因为它所处的环境至少在部分上影响和塑造了它在当下的状况。从空间上来看,某些事物之间或许呈现出相互隔绝、毫不相干的样子,但若从时间维度上来看,所有事物都处于一种相互关联的矩阵之中,没有任何事物拥有绝对的本质属性或是纯粹由自我决定的;它们都离不开与其他变化中的事物的关系。

与以康德为代表的欧陆道德哲学传统不同,实用主义伦理学很少空洞地谈论形而上的道德问题,也从来主张用一套抽象、僵化的道德标准来指导或衡量具体行为的伦理价值,而是强调具体的选择在特定语境下的伦理适当性,也强调我们有关伦理问题的探讨必须立足并服务于当下的伦理需要。这也正是约翰逊的实用主义伦理思想的关键所在。他在小说中的伦理表达绝非为了道德教条,因为教条主义者关心的总是如何用设定好的是非标准去评价具体行为的道德属性,而约翰逊却想让读者知道,我们的基本伦理问题绝不等同于有关是非对错的道德说教。恰如斯托霍夫所说:“约翰逊的伦理思想并不简单关注谁对谁错的问题,它的作用是正确理解世界并改变自身的品

性。”^{[13](112)}对约翰逊来说,“正确理解世界”就是用非本质主义的眼光看待世界,认识到包括自我、种族和身份等在内的一切观念都不过是人为建构物,它们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实体指涉对象;万事万物之间永远存在相互依存关系,我们对彼此的依赖程度远远超出我们已有的认识水平。

约翰逊在他的众多新奴隶叙事作品中都大量使用了历史素材,尤其是在他的两部长篇小说《牧牛传说》《中间航道》以及短篇小说集《捉魂人及其它故事集》中。有不少论者都把这几部作品看成是琳达·哈琴所说的“历史书写元小说”的代表^④,这种看法有点牵强。虽然它们的确运用了诸多历史书写元小说的形式技巧,但它们并不具备它的最重要特征,即:

用文学的手法来引起人们关注和反思我们用来再现世界的那些机制,特别是文学和历史再现中的政治。所谓再现的政治,就是指那些表面看上去清白无辜、但实质上是有意识形态偏向性、特别是出于权力和话语操控目的的再现的媒介、手段、符码和程序等。^{[15](94)}

相比之下,更恰当的做法应该是把这些小说看成是作者的实用主义历史/伦理观的文学表达。斯托霍夫准确地指出:“约翰逊的历史观从根本上来说是实用主义的。了解过去的重要意义主要在于它是通往更伟大目的的途径:提升当前的健康状况。约翰逊强调当下的人们有权利自由地使用过去,应该认识到历史就像这个国家自身一样,总是在当下时刻被不停创造着。”^{[13](115)}对约翰逊来说,历史就是一部“有用的虚构作品”、一种对世界的建构,它可能缺少那种绝对意义上的客观真实性,却可以为今天的人们提供指引,推动有益的行动。在他看来,评价一种历史叙述的标准不是它对过去事件的忠实程度,而是它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人性信仰的需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我们在未来建设一个“友爱社会”的希望。约翰逊并不否认有任何真实的历史叙述的可能,他只是更倾向于讲述一种对今天和未来更有好处的历史故事,哪怕它是一种虚构或对真实历史的篡改。

三、约翰逊小说的政治性及其伦理表达

自问世以来,约翰逊的小说就一直面临很多争议。一方面,人们承认他在新奴隶叙事方面成就斐然,拓宽了黑人文学的美学疆界,但另一方面,很多人也批评约翰逊在创作中有逃避政治的倾向,认为他背叛了黑人民族主义传统,没有让文学在改善黑人的社会政治地位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众多的批评和质疑声

中,哈代克(R. Hardack)的意见最有代表性。他认为,虽然约翰逊在小说中也经常提及蓄奴制,偶尔也会描写黑奴遭受的肉体折磨,但他主要还是把蓄奴制当成一种“几乎只造成了心理上的和形而上的创伤、却没有历史或政治后果的隐喻”^{[16](1030)}来思考的。以《牧牛传说》中的安德鲁和《中间航道》的鲁特福德为例,他们在各自的故事中经受了各种形式的精神奴役,却唯独没有肉体奴役。哈代克也不认可约翰逊把种族身份视为主观幻象、把政治视为业报轮回的佛教观点。在哈代克看来,黑人至今仍未获得完全平等意义上的种族身份,他们作为独立、平等的文化群体的身份仍需继续加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黑人把种族身份的观念当作一种空洞的范畴加以超越显然为时尚早。

尤其不能让哈代克接受的是,约翰逊似乎暗示大多数形式的种族奴役其实都是黑人自我招惹的妄想症,好像他们能否得到自由只是一个主观选择的问题。约翰逊劝告人们放弃改造外部世界,转而去改造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就好比佛教劝导人们去改造自己的主观精神一样。哈代克还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源头、超验主义者爱默生那里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爱默生曾经认为黑人和白人同样应该为奴隶制度的存在负责,他说:“我们当然指责奴隶主,但同时也应该指责奴隶,因为他们自己甘愿被当做奴隶对待。”^{[16](1043)}哈代克认为,约翰逊和他的这位实用主义祖师一样,“都主要把奴隶制度视为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而非历史意义上的束缚”^{[16](1043)},他们对奴隶制度的描述只能是一种浪漫化的想象,很少能够提出具体有力的批判。

不可否认,哈代克对约翰逊的批评有一定道理。我们在约翰逊的作品中的确很少碰到直接的政治表达,他很少像赖特或鲍德温那样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白人种族主义者,也很少试图唤起读者的政治革命意识。而且,那些有着强烈革命意识和政治热情的黑人民族主义者——比如《牧牛传说》中的乔治和《梦想家》中的祖贝纳——都没能得到约翰逊的肯定性描写。然而,我们若就此批评约翰逊的创作美学、指责他是在逃避政治表达就错了。即便约翰逊本人多次明确表示不喜欢政治文学,但其实他反对的只是那种把小说简化为政治宣传品的粗劣做法。他说:“我坚信艺术应该为社会负责……它履行这种社会责任的方式很简单,那便是不管它是什么作品、什么书、什么产品,它都是我们掷入公共空间的事物。它是一个公共行为,是一种人类的表达。而我们应该为一切形式的人类表达、为我们的各种行动和作为负责。”^{[17](171)}而任何公共行为其实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行为,因为它们都涉及到人类应该以何种方式相互交往、共同

生活以及分配权益等。康纳和奈什(Conner & Nash)正是在这种广义的政治上理解约翰逊的作品的。在他们看来:“约翰逊的作品绝对与政治有关”^{[13](xvi)},只不过约翰逊不喜欢只谈论那种与权力斗争和社会革命有关的狭义政治,而是和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一样,“把政治看作是哲学、伦理学和美学的一部分、甚至是它们的补充”^{[13](xvi)}。

对约翰逊来说,艺术创作的美学目的其实也是政治目的,不管我们是为了创作美的艺术还是更正义的社会,我们对真善美的追求都是统一的、同样的追求。受狭隘的政治观影响,大部分黑人作家都很少从哲学的角度深入思考有关自由、身份和种族的问题,而约翰逊所倡导的黑人哲理小说的使命就在于为读者开创一个“完整视野”(whole sight),让他们——尤其是黑人——学会从更高的层面上理解自我身份以及与他人关系。恰如拉什迪所指出的:“解放我们的世界观就是约翰逊的真实政治愿望。”^{[13](xvii)}在约翰逊看来,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的美国已经与奴隶制时期的美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政治行动的理解也应当做出相应调整。极端不公正的压迫性种族制度已不复存在,然而很多人——包括白人和黑人——仍旧囿于狭隘的、对抗性的思维模式中难以自拔。正是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了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性别主义、以及压迫、歧视和仇恨这些让人憎恶的社会产物。

可以说,约翰逊的小说创作从未逃避政治思考,他只是拒绝那种把政治等同于种族或阶级权益博弈的狭隘认识。他的政治关切的核心不是种族和阶级斗争,恰恰相反,他最关心的是今天的人们如何化解对彼此的误解和仇恨、并认识到相互之间的共存性,进而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友爱社会创造条件。在接受郝什(Ghosh)访谈时,约翰逊表示说:“我不认为我的美学立场与所谓的‘抗议小说’是对立的。”^{[18](371)}他认为自己的小说其实也是一种广义上的抗议小说,只不过他抗议的对象不再是白人及其种族主义行为。而是“人类的无知和愚蠢(种族主义是其中一部分)、错觉与自私”^{[18](370-371)}。他不否认今天的美国社会仍然残留着种族主义的幽灵,但这已经不再是最主要的。黑人在今天的生活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奴隶制度和种族奴役,而是它们留下的心理创伤和阴影,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种种行为后果,比如懒惰、不负责任、不成熟等。在经典奴隶叙事中,奴隶制的存在是导致黑人产生反社会行为的根源,为了获得自由,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逃避奴隶制度的压迫和束缚,哪怕最终为自己、家人和社会带来两败俱伤的后果也在所不惜。然而对

于约翰逊小说中的大部分主人公(以及生活在今天的美国黑人)来说,奴隶制度已经成为历史,它不应该再被当作逃避家庭和社会责任的借口。今天的黑人已经享有和白人基本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他们的生命意义不再是被预先决定的,而是由自己的所作所为来决定。奥巴马已经当选美国首位黑人总统,无数同样杰出的黑人也已经出现在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约翰逊认为这说明在今天的美国,“无论肤色,谁都可以出类拔萃;不分种族,谁都可以服务他人。”^{[19](14)}他号召黑人放下仇恨,忘记伤痛,不要再自暴自弃,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去发愤图强,为自己、家人和社会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明天。这正是约翰逊小说的最终政治和伦理诉求。

四、结语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受美国特殊社会语境以及文学发生机制的影响,黑人作家们还不觉得“好的写作”与“政治性写作”有什么太大的矛盾。但到了八十年代以后,这一矛盾便日益凸显出来。一味继续坚持用旧的政治标准来衡量黑人文学使得很多黑人作家们越来越失去创作活力,形式粗糙、内容雷同的抗议小说难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以约翰逊为代表的新一代黑人作家才涌现出来。他们在艺术形式上大胆创新,大量借鉴现代和后现代叙事技巧,在内容和主题上也不再拘泥于种族政治题材,而是广泛涉及黑人生活经验的方方面面,极大深化了黑人文学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虽然经常有人批评这是对黑人文学的政治和伦理使命的逃避,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是一种源自对政治和伦理的狭隘认识的偏见。

在众多研究者中,约翰逊最认可利特尔(J. Little)对自己的评价,因为只有利特尔最深刻地理解了他的文学创作理想。利特尔指出:“在精神信仰、意识形态和哲学思想方面,约翰逊和金都非常相似。”^{[20](3)}的确,约翰逊不但创作了美国第一部以马丁·路德·金·为主要人物的虚构小说,他还发表了多篇纪念金的文章,而且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在主题上回应了金的价值理想。金在1960年的一次演讲中曾告诫他的听众们:“我们最终的目的必须是创建一个友爱社会。”^{[19](2)}约翰逊和金一样都把艺术创作视为一项神圣的道德工程,但他绝不是把艺术还原为道德教条,而是通过文学去增进人与人之间跨越种族、阶级、信仰、肤色、文化的理解和沟通,让人们意识到彼此的密切关联和兄弟情谊,并未最终建造金所设想的“友爱社会”

做出努力。他说:

艺术是通往他者的桥梁,从一个主体到达另一个主体,因此艺术经验即便不是普遍的,它至少也是带有主体间性的——而这正是我们不管是从科学还是从艺术中最应期待的好东西。艺术具有一种认知使命,它深深地鄙视狭隘的地方文化主义(cultural provincialism);不过除了带给我们知识,以及改正僵化的世界观,艺术还可以做得更多。^{[21](237-238)}

注释:

- ① 约翰逊更习惯称之为“黑人叙事”(black narrative)。
- ② 指在黑人男性中常见的一些不良习性,主要表现为“温顺忠实但性情懒惰,谦卑顺从但喜欢撒谎和偷窃等”,参见 Tim Ryan, *Calls and Responses: The American Novel of Slavery since Gone with the Wind*.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P, 2008, p.14.
- ③ “实用多元主义”(practical pluralism)是由波斯诺克最先使用的术语,意思接近于“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或“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它们都常被用来替代人们把美国社会比作“文化大熔炉”的说法,以凸显不同文化和种族之间相互包容、求同存异的融合过程。参见 Marc Conner and William Nash, eds. *Charles Johnson: The Novelist as Philosopher*, p.84.
- ④ 参见 William Gleason, “The Liberation of Perception: Charles Johnson's *Oxherding Tale*”, *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Forum*, 1991(4), p.707; Barbara Thaden, “Charles Johnson's *Middle Passage* as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College English*, 1997(7), p.753; Daniel Scott, “Interrogating Identity: Appropri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Middle Passage*.”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1995 (4), p. 654.

参考文献:

- [1] Marc Conner, Passing the Three Gates: Interviews with Charles Johnson (Book Review) [J].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2005(3): 481-483.
- [2] 林元富. 历史与书写——当代美国新奴隶叙述研究述评[J]. *当代外国文学*, 2011(2): 152-160.
- [3] Tim Ryan. *Calls and Responses: The American Novel of Slavery since Gone with the Wind* [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4] Ashraf Rushdy. Neo-Slave Narratives [C].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Eds. W. Andrews, et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5] Ashraf Rushdy. Neo-Slave Narratives: Studies in the Social Logic of a Literary Form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6] Ashraf Rushdy.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Allmuseri: Charles Johnson and the Subject of the Narrative of Slavery [J].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1992(2): 401-412.
- [7] Linda Hutcheon.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 Fic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 [8] ZZ Packer. Thinking Outside the Icebox: Review of Dr. King's Refrigerator and Other Stories by Charles Johnson [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r. 6, 2005.
- [9] Elizabeth Ann Beaulieu. Black Women and the American Neo-slave Narrative: Femininity Unfettered [M].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9.
- [10] Charles Johnson. The End of the Black American Narrative [EB/OL]. The American Scholar (Summer 2008). <http://www.theamericanscholar.org/the-end-of-the-black-american-narrative>.
- [11] Charles Johnson. Turning the Wheel: Essays on Buddhism and Writing [M]. New York: Scribner, 2003.
- [12] Gena Chandler. Mindfulness and Meaning in Charles Johnson's 'Dr. King's Refrigerator' [J].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2013(3): 328-347.
- [13] Marc Conner, William Nash. Charles Johnson: The Novelist as Philosopher [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7.
- [14] Linda Selzer. Charles Johnson in Context [M].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9.
- [15] 陈后亮. 琳达·哈琴的后现代主义诗学研究[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1.
- [16] Richard Hardack. Black Skin, White Tissues: Local Color and Universal Solvents in the Novels of Charles Johnson [J]. Callaloo, 1999(4): 1028-1053.
- [17] Jonathan Little. An Interview with Charles Johnson [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93(2): 159-181.
- [18] Nibir Ghosh, From Narrow Complaint to Broad Celebration: A Conversation with Charles Johnson [J]. MELUS, 2004 (3/4): 359-378.
- [19] Charles Johnson. The King We Need: Teachings for a Nation in Search of Itself [J]. Shambhala Sun, 2005(3): 42-50.
- [20] Jonathan Little. Charles Johnson's Spiritual Imagination [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7.
- [21] Charles Johnson. Afterword [C]// John Whalen-Bridge, Gary Storhoff. The Emergence of Buddhist American Litera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9.

“Art is the bridge to the other”: Charles Johnson's novel ethics

CHEN Houliang, SHEN Fu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y, Jinan 250014, Chin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It has been a very controversial task to evaluate Charles Johnson's works. Some critics praise him for his contribution to promoting black literature with his neo-slave narratives, while many others criticize him for his betrayal against black nationalism. From Johnson's perspective, however, the aesthetic concern of literary creation is in accordance with its political concerns. No matter whether we aim to create beautiful art or a just society, we are seeking the same values of Truth, Beauty, and Goodness. The moral novel in its real sense should lead readers to clearing up misunderstanding and improv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so as to promote the creation of a harmonious “beloved society”. Such an aim is at once ethical and political, since it intends not only to improve human relationship transcending race, class, color, and nation, but also to bring about a final social change.

Key Words: Charles Johnson; moral fiction; novel ethics; neo-slave narrative

[编辑: 胡兴华]